

# 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途徑

許志嘉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 摘 要

爲了能更系統化、科學化地進行研究，東西方學者發展出許多研究途徑來探討中共外交政策，本文旨在介紹、分析這些研究途徑，說明這些研究途徑的優缺點，提供國內中共研究、外交政策研究及中共外交政策研究者參考。

從有關中英文著作分析，中共外交政策主要研究途徑有九種：歷史文化、意識形態、國家利益、決策領袖個人、戰略三角、國際體系結構、派系政治、決策系統及多元因素等。這些研究途徑各有優缺點，但對中共外交研究都頗具解釋力，在中共外交政策學術研究方面，提供了極具價值的研究方法。

歷史文化、意識形態及決策領袖個人等三種研究途徑，以中共爲特殊對象進行研究，提供深刻而獨到的解析面向，惟易受簡單化、特殊化之批評；戰略三角、國際體系結構研究途徑從國際層面著手，但未掌握國內因素的制約；派系政治研究途徑擴大了研究的視野，但概念與運作上則受到質疑；國家利益及決策研究途徑提供了更科學性的研究向度，惟兩者皆易受到時空人事環境轉移而轉變的限制。

多元因素研究途徑雖有過於複雜化的質疑，但研究者可從此途徑作爲分析的切入點，再針對不同時空環境，不同議題對象，參照其他研究途徑的優點，歸納整理出一套更有系統的研究方法。

**關鍵詞：**中共外交、外交政策、研究途徑、中共、外交

\* \* \*

## 壹、前 言

外交政策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共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雖然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歷史只有四十餘年，但是海內外學者對中共外交政策研究的著作頗豐，尤其是美國學者對這方面的研究，不論在質與量方面都有相當高的成就。這些長期研究成果的積累，對於中共外交政策的理解提供了學術上的支持，同時，也有助於吾人對中共外交政策

的了解，促進對這個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共黨體制國家外交行為有較深刻的認識，從而避免由於誤判而引起國際間的衝突。對於衝突的減低與化解，以及促進全球社會或亞太地區的和平安定與繁榮，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實提供了相當程度的助益。

國際關係學本身就是一門很年輕的學科，雖然發展的歷史很短，但在學者的努力下，這門學科已創造不少成果，其中外交政策的研究更是這門學科的一個重要的研究面向，為了使研究的成果更系統化、科學化，以達到「描述、解釋和預測」等最基本的科學性研究目的，<sup>①</sup>學者們研究發展各種「研究途徑」(Research Approach)以便使研究分析有更好的方法與向度，以達到科學化的要求，或至少取得更有意義的解釋效力。

在外交政策的研究中，西方學者，特別是美國學者，提出許多極具意義的研究途徑來分析外交政策，發展出理性模式(Rational Model)、組織機構模式(Organizational-Institutional Model)、官僚政治模式(Bureaucratic Politics Model)、權力菁英模式(Power Elite Model)、多元論模式(Pluralist Model)等等研究途徑，<sup>②</sup>對外交政策研究提供極具參考價值的研究方法，也使得外交政策研究的發展更有系統、更科學化。

在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方面，學者們為了能夠更準確地理解中共外交政策，在研究方面也發展出許多不同的研究途徑，本文便希望從東西方學者對中共外交政策研究的中英文著作中所採行的研究途徑進行整理、分析與介紹的工作，俾提供國內中共外交研究者基本的參考資料。同時，希望透過對研究途徑的探討與分析，提供研究者思考更有意義的研究途徑，使中共外交研究能夠取得更系統化、科學化的發展，對學術研究有正面的貢獻，同時，也提供相關決策單位理解中共外交政策行為一個更具效度的分析面向。

## 貳、中共外交政策研究途徑簡介

關於中共外交政策研究方法的探討與分析，西方學者一直是這個學門領域的主要參與者；中國大陸學者對中共外交的分析多數是以「外交史」作為此領域的主要研究範疇，以中共的「官方說法」作為分析的主要依據；國內的學者早期多以意識形態及統戰的觀點來詮釋中共外交，有些具有「反共」色彩，研究範疇亦以外交史為主，近期的研究則受到西方研究成果與方法的影響，採取各項研究途徑，對中共外交相關議題進行解釋性的分析。

註① Herbert Feigl, "The Scientific Outlook: Naturalism and Humanism," H. Feigl & M. Brodbeck, eds.,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3), pp. 10~11.

註② 這些研究途徑的分析與解說請參閱 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Barry B. Hughes,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 Company, 1978).

從現有的文獻來看，西方學者，特別是美國學者，對中共外交研究的專著與報告頗多，且研究的範疇與方法也相對多元，相較來看，兩岸學者對此學門議題的研究雖已強調研究方法的運用與分析，但在研究的途徑與成果上，西方學者的研究確比兩岸學者的研究較為豐富。當然，此涉及彼此的研究環境、研究人員數量等主客觀條件的限制。

從有關中共外交研究的中英文著作中，中共外交的主要研究途徑基本上包括以下九種：歷史文化、意識形態、國家利益、決策領袖個人、戰略三角、國際體系結構、派系政治、決策系統及多元因素等。<sup>③</sup>這些研究途徑受到不同年代的社會科學、國際關係學與中共研究思潮的衝擊，以及學者所處研究環境的制約而出現。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研究途徑雖然有理論上的堅持，但並不影響研究的成果，且有很多學者曾嘗試多種不同研究途徑，希望在這門學科的研究中取得更豐富的成果。

基本上，歷史文化、意識形態、決策領袖個人、國家利益研究途徑是一九六〇年代，中共外交政策研究的主要學派；一九六〇年代末到一九七〇年代，戰略三角及派系政治研究途徑則儼然成爲中共外交政策研究的主流，<sup>④</sup>國際體系結構研究途徑也受到學者的重視；一九八〇年代以來，許多學者採用決策系統及國內外多元因素研究途徑來研究中共外交政策，此二研究途徑日益受到學界的重視。

## 一、歷史文化研究途徑

歷史文化研究途徑主要是以「中國中心主義」著眼，試圖從中國過去的歷史文化來理解中共的外交政策行爲，此途徑把傳統中國中心主義的持續，與中國對外在世界

註③ 有關中共外交政策研究途徑分析著作頗多，可參閱的分析文章包括：Bin Yu,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oblem and Prospect," *World Politics*, No. 46 (January 1994), pp. 235~261; Samuel Kim, "New Directions and Old Puzzle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2nd 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9), pp. 3~30; Friedrich W. Wu, "Explanatory Approaches to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Critique of the Wester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No. 13 (Spring 1980), pp. 41~62; Harry Harding,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in David L. Shambaugh, ed., *The American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3), pp. 14~43; Harry Harding,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2, No. 2 (March-April 1983), pp. 1~19; Rong Zhi, "Two View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34, No. 2 (January 1982), pp. 285~293; Michael Yahuda, "Perspectives on China's Foreign Policy," *China Quarterly*, No. 95 (September 1983), pp. 534~540; Michael Ng-Quinn, "The Analytic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7, No. 2 (June 1983), pp. 203~224; Jonathan D. Pollack, "Interpret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29, No. 4 (July-August 1980), pp. 84~88; 石之瑜, *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政治文化與心理分析* (台北：五南圖書公司，民國八十四年)，第一章。

註④ Bin Yu, *op. cit.*, p. 236.

觀感的概念化，視為影響中共外交政策行為的主要變數。

採用歷史文化研究途徑的學者，主要的西方學者包括：費正清（John K. Fairbank）、Mark Mancall、C. P. Fitzgerald、Francois Geoffroy-Dehaume、Albert Feuerwerker、J. Cranmer-Byng、Morris Rossabi等。<sup>⑤</sup>國內學者石之瑜、香港學者廖光生等也曾採此途徑進行研究。<sup>⑥</sup>

早期採用此研究途徑的學者多為歷史學者，他們利用歷史資料的分析，試圖從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詮釋中共外交政策及行為，強調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文化等中國傳統的信仰體系，仍是影響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要根源；在方法論上，早期的學者多採歷史分析與推論方法，後來的學者在行為主義的影響下，也引進行為科學研究方法，採用地緣政治學、文化心理學、政治心理學等科際整合方式進行研究。

歷史文化研究途徑提供了深層次的文化傳統分析層面，來解釋中共外交政策的具有中國傳統的持續性，從宏觀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此研究途徑說明了中共外交政策中「傳統中國文化」影響的重要性，也論證了傳統歷史文化即使歷經國家政權轉移，仍然對高舉馬列主義大旗的中共政權有一定的制約性。中共官方文件便常出現具道德色彩、反帝國主義等具中國傳統烙印的字眼。

但是，作為中國政權正統繼承人的中共，其建政以來官方的文件，以及領導人的談話中，都凸顯了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政權，有意拋棄傳統中國文化的束縛，重建屬於中共的一套「無產階級專政」制度，闢建自己的歷史。<sup>⑦</sup>從這樣的思路來看，縱然中共領導層不自覺地受到中國傳統文化與歷史經驗影響，但他們卻自覺地企圖走出中

註⑤ 參閱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John K. Fairbank,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No. 47 (April 1969), pp. 449~463; Mark Mancall,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No. 349 (September 1963), pp. 14~26; C. P. Fitzgerald, *The Chinese View of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Francois Geoffroy-Dechaume, *China Looks at the World*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7); Norton Ginsberg, "On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a World Order," in Tang Tsou, ed., *China in Crisis*, Vol.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Albert Feuerwerker, "Chinese History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No. 402 (July 1972), pp. 1~14; J. Cranmer-Byng, "The Chinese View of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na Quarterly*, No. 53 (January-March 1973), pp. 67~79; Morris Rossabi,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註⑥ 參閱石之瑜，*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台北：三民書局，民國八十三年）；Chih-Yu Shih(石之瑜)，*The Spiri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Psychocultur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1990)；廖光生，*排外與中國政治*（台北：三民書局，民國七十七年）。

註⑦ 中共建政以後便強調要求人民重新學習，改變舊思想，強調馬列主義的重要性，參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官方更提出破幾千年來毒害人民的舊思想、文化、風俗、習慣等「破四舊，立四新」運動，參閱人民日報（北京），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版一。

國傳統歷史文化。同時，此研究途徑也忽略了國際環境對中共外交政策的影響。因此，如果單自歷史文化研究途徑來解釋中共外交政策行爲，似乎無法提供完整且更深刻的分析，例如，中共的參加韓戰、支援第三世界國家社會主義政黨發動革命等；而且，中共政治發展過程中，充滿非傳統中國文化的意識形態色彩，使得此項研究途徑的周延性受到學界的挑戰。

## 二、意識形態研究途徑

意識形態研究途徑主要是從中共高舉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圖騰著手，在中共是一個全球最大的組織性意識形態國家的論證下，<sup>⑧</sup>他們企圖從中共所提出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意識形態脈絡中，探析中共外交政策行爲的根源。此研究途徑主要是在一九五〇年的韓戰後興起，雖然中共發展的歷史中一再強調意識形態的重要性，但早期西方學者仍相信，作爲中國政權繼承者，中共難脫前述中國中心主義格局，然而，中共的參加韓戰，使許多學者認爲，必須重視意識形態對中共政策的影響，而從意識形態角度來探析中共外交政策。其中一部分學者主張，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來自馬列主義，一部分則同時強調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看法是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要根源。

採用意識形態途徑來研究中共外交政策的學者中，主要的西方學者包括：Benjamin I. Schwartz、Harold C. Hinton、J. D. Armstrong、D. S. Zagoria 等，<sup>⑨</sup>國內學者尹慶耀也曾採此途徑說明中共外交政策。<sup>⑩</sup>

意識形態研究途徑自中共高倡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提供了一個共產黨政權對外政策行爲的「社會主義理想」模式，透過馬克思有關國際關係的理論、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中的矛盾論、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等意識形態理論，論證中共外交政策行爲的根源係來自意識形態的指導，共產黨不只是高舉意識形態圖騰，同時，也試圖把這一套意識形態應用到外交政策上，不但作爲中共外交政策的指導，還是外交行爲實踐的方式。

這樣的研究途徑提供了吾人一個有別於傳統西方外交政策研究的方法，跳脫西方邏輯思維，來找尋中共外交政策中的特殊性，並解析中共外交政策行爲中與傳統中國歷史文化不盡相同的理論根源，爲中共進行的世界革命、反帝國主義外交政策提供了

註⑧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2nd e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 22.

註⑨ 參閱 Benjamin I. Schwartz, *Communism and China: Ideology in Flux*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Harold C. Hinton, *China's Turbulent Que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2); J. D. Armstrong,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nited Front Doctri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Donald S. Zagoria, "Ideology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G. Schwab, ed.,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A Glob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yrco, 1978); Peter Van Ness, *Revolu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註⑩ 參閱尹慶耀，*中共的統戰外交*（台北：幼獅文化公司，民國七十三年）。

具說服力的解釋。

意識形態研究途徑以中共高倡的「理論」來詮釋中共外交政策，雖能說明中共外交政策中社會主義道德色彩，但是，作為國際社會主體的一員，中共顯然不是只單純受到意識形態的指導，且這套意識形態並非放之四海皆準，中共領導者對此意識形態擁有解釋權。準此而言，中共意識形態究竟是指導外交政策，或是為外交政策作辯護，其間的辯證邏輯關係仍值得進一步探究。因此，把意識形態作為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是否能夠周延地解釋中共外交政策，也受到質疑。

### 三、決策領袖個人研究途徑

決策領袖途徑主要是從中共外交政策決策領導人個人進行分析，他們認為作為一個高度極權的列寧式國家，中共外交政策決策者個人行事風格及理念，才是決定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尤其是在毛澤東時期，中共重大決策多由毛澤東個人拍板定案，毛澤東個人的權威便制約著中共外交政策，他們企圖從毛澤東個人的理念、行事風格、個人認知等，去理解中共外交政策。

曾採用此研究途徑來解釋中共外交政策的學者中，主要的西方學者包括：金淳基（Samuel Kim）、Michel Oksenberg、白魯洵（Lucian Pye）、John Gittings等。<sup>①</sup> 國內學者葉伯棠也主張採用此研究途徑。<sup>②</sup>

此研究途徑提供決策領袖個人因素來詮釋中共外交政策的方法，對高度極權的中共政權而言，其外交決策過程中，最高領導者確實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毛澤東高度權威領導模式下，透過對毛澤東個人扮演角色、性格、行事風格及其思想理念的研究，確可掌握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要脈絡。

在高度極權的中共政治運作中，決策領袖研究途徑從個人層次著手來解析中共的外交政策根源，雖符合中共政權運作現況，不過，所面臨的問題是，在複雜的中共政治運作中，只透過對決策領袖個人及其思想著作來透析中共外交政策，似乎過於簡單化。國際現實環境因素與中共內部政局權力運作，決策領袖雖是中共重大決策拍板者，但是否能夠完全體現其意志，且其他因素對決策領袖個人的制約情形也值得深入探討。同時，在毛澤東、鄧小平死後的中共政局，決策領袖個人要素是否仍能持續解釋中共外交政策也令人質疑。因此，僅從決策領袖個人來解釋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可能出現過於簡單化的情形，無法解釋整個中共外交政策全貌。

註① 參閱 Samuel S. Kim, "The Maoist Image of World Order," World Order Studies Program Paper,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7; Michel Oksenberg, "Mao's Policy Commitments, 1921~1976,"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25,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76), pp. 1~26; Lucian W. Pye, "Mao Tse-tung's Leadership Styl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1, No. 2 (Summer 1976), pp. 219~235; John Gittings, *The World and China, 1922~1972*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4).

註② 參閱葉伯棠，「論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見張雪艷主編，葉伯棠先生中國大陸研究紀念文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八十年），頁一一九～一四九。

#### 四、國家利益研究途徑

國家利益研究途徑主張中共就如同西方國家一般，必須從考量敵對或同盟的超級強國的經濟及軍事權力，評估最符合其國家利益的情形下，來制訂外交政策。此研究途徑係受到現實主義思潮的影響，把中共視為一般國際社會主體國家，是整個全球體系的一份子，前述三種研究途徑，主要是從中共內部找尋其外交政策的根源，強調中共外交決策的特殊性，而此研究途徑跳脫這樣的局限性，把中共外交研究納入一般國際關係研究的體系，把中共外交政策的制訂視為一個理性決策過程，而不只是單純的傳統文化、意識形態或獨裁權威的決策。

採用國家利益研究途徑進行中共外交政策研究的學者中，主要的西方學者包括：Allen Whiting、Donald Zagoria、Thomas W. Robinson、范乃思（Peter Van Ness）、I. C. Ojha、Michael Yahuda、Melvin Gurtov、Byong-Moon Hwang、J. D. Armstrong、Robert G. Sutter 等，<sup>③</sup>國內學者李登科、大陸學者謝益顯、石志夫等也從此途徑進行分析。<sup>④</sup>

國家利益研究途徑主張，中共的決策者是採取理性的態度來制訂外交政策，中共的決策者主要是在中共國家利益的基礎上，決定其外交政策，國家安全與政經利益是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學者把理性模式（Rational Model）研究途徑引進到中共外交的研究，<sup>⑤</sup>中共外交決策就如同其他國家一樣，在符合國家利益的最高考量下，以理性的判斷何種政策最符其國家利益，再決定採行何種外交政策行爲。

此研究途徑從理性而廣泛的角度來研析中共外交政策，擺脫一種「反共」研究。

註③ 參閱 Allen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Donald Zagoria, *Vietnam Triangle* (New York: Pegasus, 1967); I. C. Ojha,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Transition* (Boston: Beacon, 1969); Thomas W. Robinson, "The View from Peking: China's Policies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Japan," *Pacific Affairs*, Vol. 45, No. 3 (Fall 1972), pp. 333-355; Peter Van Ness, *op. cit.*; Michael Yahuda, *China's Role in World Affair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8); Melvin Gurtov & Byong-Moon Hwang, *China under Threat: 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J. D. Armstrong, *op. cit.*; Robert G. Sutter, "Prospects for Change in Peking's Contemporary Foreign Policy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David S. Chou, ed., *Peking's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80s*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9), pp. 39-56.

註④ 李登科，冷戰後中共對中東地區的外交政策（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八十四年）；謝益顯，外交智慧與謀略——新中國外交理論和原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石志夫，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八九年十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註⑤ 理性模式假定決策者係基於理性，在處理議題時先界定本身的價值與目標，整理出可能的政策選擇，評估利弊得失後，再做出決策。參閱 Barry B. Hughes,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 Company, 1978), pp. 6-7.

同時，不以激烈的意識形態革命政權來看待中共，提高中共研究的學術性，也與國際關係研究主流相容，許多學者紛採此途徑研究中共外交政策。此研究途徑雖使中共外交政策研究能走向更客觀的學術分析，提供更有價值的研究體系，然而，此途徑雖掌握到中共外交政策的共性，卻未能夠完全考量到中共外交政策所具有的特殊性，國家利益常隨時空與領導人而轉變其優先順序，<sup>⑥</sup>而即使能掌握國家利益，也可能陷入循環論證的危險。<sup>⑦</sup>同時，此途徑仍以國家整體為主要研究範疇，似乎把中共視為一個單一的行為者，未能完全考量到中共內部組織結構、不同政治勢力對國家利益見解的差異性，過於強調國家中心主義。

### 五、戰略三角研究途徑

戰略三角研究途徑在一九七〇年代受到許多學者的重視成為中共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研究途徑。此途徑把中共、蘇聯與美國視為世界三個主要強權，三強之間形成戰略三角關係，戰略三角關係的利害互動是制約中共外交政策行為的主要根源。此研究途徑基本上是受到現實主義思潮的影響，他們把中共作為一個整體看待，從中共與美國及蘇聯的戰略互動中，探析中共外交政策。

採用戰略三角研究途徑來研究中共外交政策的學者中，主要的西方學者包括：Ilpyong Kim、Herbert J. Ellison、Gerald Segal、Douglas T. Stuart、Strobe Talbott、Lowell Dittmer、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等，<sup>⑧</sup>國內學者則有陳明等。<sup>⑨</sup>

戰略三角研究途徑將美國及蘇聯兩個超級強權，及作為一個新興強權的中共當作國際戰略上的三個最主要國家，此三個國家掌控的資源龐大，彼此間形成的戰略互動關係便制約著彼此的外交政策，一九七〇及一九八〇年代，戰略三角研究途徑成為國際關係研究上的一個重要研究模式。許多學者便將之引進到中共外交政策研究中，不過，戰略三角研究途徑卻一直未能成為中共外交政策研究途徑的主流。

註⑥ Larry Wortzel, "China Pursues Traditional Great-power Status," *Orbis*, Vol. 38, No. 2 (Spring 1994), p. 159.

註⑦ 石之瑜，「此路不通——論江澤民外交的民族信心前提」，見中國大陸研究學會編印，*江澤民政權與兩岸關係*（台北：中國大陸研究學會，民國八十五年），頁一五。

註⑧ Ilpyong Kim, 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87); Herbert J. Ellison, ed.,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 Global Perspectiv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2); Gerald Segal, *The Great Power Triangl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2); Douglas T. Stuart & William T. Tow, eds., *China Factor*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81);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33, No. 4 (July 1981), pp. 485~515; Kenneth G. Lieberthal, *Sino-Soviet Conflict in the 1970s: Its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1978).

註⑨ Philip M. Chen (陳明),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 Communist China's Polici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Peter Kien-hong Yu & Philip M. Chen, eds., *Models & Case Studies on Washington-Moscow-Peking* (Taipei: Asia and World Institute, 1987), pp. 51~62.



戰略三角從國際體系互動層面來探析中共外交政策，從而提供研究者一個不同的分析角度來詮釋中共外交政策，然而，戰略三角的概念一直受到學者的質疑，因為對當時的國際現實而言，中共的實力遠低於美國與蘇聯兩個超強，中共最多只能算是個區域強權，把中共與美蘇並列為世界三強來進行分析，引起許多現實主義學者的質疑。此外，戰略三角研究途徑基本上主要是在解釋中共對外關係的互動，對中共外交政策分析的解釋強度較不夠。因此，戰略三角研究途徑雖然在一九七〇及八〇年代盛行一時，但卻未能成為中共外交政策研究途徑的顯學。

## 六、國際體系研究途徑

國際體系結構研究途徑主張，中共是全球大環境下的一員，國際體系結構會制約中共的外交政策，國際體系本身便制約著中共的角色與地位，必須從國際體系結構的角度來理解中共外交政策根源。<sup>⑩</sup>此研究途徑受到系統理論的影響，帶有環境與結構決定論的色彩。

曾採用國際體系結構研究途徑對中共外交進行研究的學者中，主要的西方學者有：Michael Ng-Quinn、John Gittings、Jonathan D. Pollack、Edward Friedman 等。<sup>⑪</sup>

國際體系結構研究途徑把中共外交研究納入全球體系規範中，強調國際體系因素是制約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要根源，他們強調中共是國際體系成員之一，在國際體系結構性制約下，中共外交政策受到國際體系結構的限制。此研究途徑凸顯國際體系對成員國的束縛，把國際層次的因素引入中共外交政策研究，強調中共是國際體系下一個普通的成員，在國際體系的制約下，中共外交政策只是在因應體系的變動。

國際體系結構研究途徑雖注意到國際體系對中共外交政策的制約，說明作為國際社會成員，中共外交政策必須反應國際環境的限制，但由於其過份強調國際體系的影響與制約，而忽略了中共國內政經互動的要素，以及中共打破現行國際體系束縛的企圖，在解釋中共外交政策行為時，似乎無法提供周延的解釋。

## 七、派系政治研究途徑

派系政治研究途徑興起於一九七〇年代，此途徑強調中共內部派系的政治互動才是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他們認為，中共高層權力菁英之間形成的派系，是制約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要變數。此研究途徑係源於中共內部政治研究，主張派系之間的鬥爭對中共政策的重要性，必須透過此種派系互動才能夠理解中共政策根源。

註⑩ 參閱 Michael Ng-Quinn, "Effects of Bipolarity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Survey*, Vol. 26, No. 2 (Spring 1982), pp. 102~130.

註⑪ 參閱 Michael Ng-Quinn, *op. cit.*; John Gittings, *The World and China, 1922~1972*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Jonathan D. Pollack, "China in the Evolv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Norton Ginsburg and Bernard A. Lalor, eds., *China: The '80s Er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4), pp. 353~374; Edward Friedman, "On Maoist Conceptualizations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China Quarterly*, No. 80 (December 1979), pp. 806~837.

曾採用派系政治研究途徑進行中共外交政策研究的學者中，主要的西方學者包括：Allen S. Whiting、Uri Ra'anana、Michael Oksenberg、Steven Goldstein、Melvin Gurtov、Harry Harding、Thomas Gottlieb、Roger Brown、Peter Van Ness、John Gaver、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等。<sup>②</sup>

派系政治研究途徑把中共外交政策研究拉回到中共國內政治互動的場域中，把中共內部的現實權力爭鬥作為決策的根源，企圖使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能夠與現實權力運作接軌。此研究途徑帶有西方外交決策模式中官僚政治模式（the Bureaucratic Politics Model）的印記，<sup>③</sup>以及政治學上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的概念，再配合中共內部權力角逐的現實，提出派系政治的概念來解析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此模式考慮到實際運作，在外交是內政的延伸的前提下，越過決策領袖個人的一人決策模式，從政治菁英著手，提出中國特有的派系政治概念來作為研究中共外交政策，使中共外交決策研究有更鮮明的行為科學色彩。

派系政治把中共外交政策研究帶進更具現實政治互動的範疇中，可是，此途徑所提出的「派系」概念卻受到質疑，中共政治運作中究竟有無派系的存在還需要進一步驗證，即使中共政治互動中確有派系鬥爭的情勢，但此種派系鬥爭是否會影響到外交政策也值得進一步驗證。雖然此研究途徑受到學界批評，但是「派系」確已成中共研究中一個重要分析概念，一九七〇及八〇年代此途徑在中共外交政策研究上成爲一個重要學派，且對當前中共外交政策研究仍有影響。

## 八、決策系統研究途徑

決策系統研究途徑主要是強調中共外交決策過程的重要性，透過對中共外交決策有關機構組織結構，以及參與決策成員對於其他國家或相關政策事務的認知的分析，

註② 參閱 Allen S. Whiting, *Chinese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70s* (Ann Arbor, Mich: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9) ; Uri Ra'anana, "Peking's Foreign Policy 'Debate,' 1965~1966," in Tang Tsou, ed., *China in Crisis*; Michael Oksenberg & Steven Goldste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Spectrum,"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23, No. 2 (March-April 1974), pp. 1~13; Melvin Gurtov & Harry Harding, *The Purge of Luo Jui-ch'ing: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Strategic Planning*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Report R-548-PR, 1971) ; Thomas Gottlieb,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t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Report R-1902-NA, 1977) ; Roger Brown, "Chinese Politics and American Policy," *Foreign Policy*, No. 23 (Summer 1976), pp. 3~23; Peter Van Ness, "Three Line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1950~1983: The Development Imperative," in Dorothy Solinger, ed., *Three Visions of Chinese Socialis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4), pp. 113~142; John Gaver,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1970: The Tilt toward the Soviet Union," *China Quarterly*, No. 82 (June 1980), pp. 214~249; Kenneth G. Lieberthal, "The Foreign Policy Debate in Peking as Seen Through Allegorical Articles, 1973~76," *China Quarterly*, No. 71 (September 1977), pp. 528~554.

註③ 官僚政治模式認為，外交政策是政府各次級部門或團體，在本位主義的考量下，互相折衝妥協後所得到的結果。參閱 Barry B. Hughes, *op. cit.*, p. 11.

據以論述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學者於一九八〇年代開始採決策系統研究途徑研究中  
 共外交政策，決策機構以及參與決策者的認知是決策系統研究途徑兩個重要的研究面  
 向。

決策機構研究主要是強調中共外交決策機構的重要性，透過對中共外交決策有關  
 機構組織結構的研究，分析中共外交決策過程，據以論述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由決  
 策機構研究面向從事中共外交政策的學者中，主要的西方學者包括：包大可（A.  
 Doak Barnett）、Kenneth G. Lieberthal、Michel Oksenberg、Michael H. Hunt、  
 Odd Arne Westad、David L. Shambaugh、Douglas Murray、John W. Garver 等。<sup>②</sup>  
 旅美學學者陳慶等也曾採此途徑進行研究。<sup>③</sup>

認知研究則是從不同層級的中共外交政策制訂者、學者與專家的理念著手，來探  
 析中共對外的認知，企圖透過中共外交決策結構中，分析決策過程各個環節參與者對  
 中共外交事務的認知，以求找尋中共外交政策脈絡根源。以認知研究面向進行研究的  
 主要西方學者包括：Gilbert Rozman、Allen Whiting、David Shambaugh、Michael  
 Hunt、Banning Garrett、Bonnie Glaser、Yaacov Vertzberger 等人。<sup>④</sup>

決策機構研究把中共外交政策研究帶向一個更趨實證研究的方向，透過對中共涉  
 外機構、外交政策智囊、外交決策過程的研究與分析，探求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這  
 樣的研究顯然受到西方外交政策研究中的組織機構模式（Organization-Institutional  
 Model）的啓發，<sup>⑤</sup>由於過去中國大陸長期對西方國家的封閉，中共外交決策體制向

註② 參閱 A. Doak Barnett,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Structure and Proces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Michael H. Hunt & Odd Arne Westa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 Field Report on New Historical and Old Research Problems," *China Quarterly*, No. 122 (June 1990), pp. 258~272; David L. Shambaugh,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Bureaucracy," *China Quarterly*, No. 110 (June 1987), pp. 276~304; Douglas Murra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Northeast Asia-United States Foru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1982).

註③ 參閱 King C. Chen (陳慶), *China's War with Vietnam, 1979: Issues, Decisions, and Implication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7), ch. 4.

註④ 參閱 Gilbert Rozman, *The 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 1978~198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Allen Whiting, *China Eyes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David Shambaugh,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Michael Hunt, "Mutual Images in U.S.-China Relations," *Wilson Paper*, No. 32 (June 1988); Banning Garrett & Bonnie Glaser, "Chinese Estimates of the U.S.-Soviet Balance of Power," *Wilson Paper*, No. 33 (July 1988); Yaacov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1952~1962*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4).

註⑤ 組織結構模式認為，政府的組織或憲政結構對外交政策的制訂有重大影響力，決策者並不易跳脫組織的束縛。參閱 Barry B. Hughes, *op. cit.*, pp. 8~11.

不被國外學者及一般研究者所知悉，隨著中共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學者的研究方能進一步走向實證研究路線，同時能夠得到較充足的資訊，進一步探究中共外交決策過程以及涉及外交決策的有關機構，使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不再限於少數決策者、意識形態等較傳統的研究範疇，而能透過中共外交決策的實際運作過程來理解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

認知研究從政治心理學角度探討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在從事中共外交相關決策者發表的談話、文件、著作中，分析中共對國際社會的認知，及中共對其他國家所形構中的「形象」。這樣的研究融合了中共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歷史文化、意識形態研究途徑的特點，企圖從更深層的理念認知層次中，抽繹出中共外交政策的心理圖象，從中共外交政策制訂的心理軌跡，進一步探索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在研究的層次、深度上提供中共外交政策研究一個更深刻的學術分析。

決策系統研究途徑確實是中共外交政策研究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此研究途徑在一九八〇年代甚受學界的重視，同時也取得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一九九〇年代此研究途徑仍受到許多學者的運用。不過，由於中共外交政策的決策仍然是高度機密，學者或可透過訪談、官方文件、有關部門功能、外交智囊及知識分子的認知等面向去分析中共外交決策，然而，中共外交政策實際決策運作時的影響則仍待進一步的檢證，且在人治色彩濃厚的中共政壇，從外交決策機構及過程的研究是否能夠真確地探討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也是一個尚待檢證的問題。

### 九、多元因素研究途徑

多元因素研究途徑主張從多層次、多面向著手，探究中共外交政策根源，學者認為，制約中共外交政策的因素錯綜複雜，僅以單一的因素來理解中共外交政策，恐不能真正理解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必須從中共內外環境因素的互動來檢證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

採取多元因素研究途徑的學者中，主要的外國學者包括：Gavin Boyd、V. P. Dutt、Harold C. Hinton、Allen S. Whiting、Harry Harding、Thomas Fingar、David Bachman、金淳基（Samuel Kim）等，<sup>②</sup>曾採此研究途徑的有旅美學者陳慶、國內學

註<sup>②</sup> 參閱 Gavin Boyd, "China's Foreign Policy: Domestic-International Linkage," in James C. Hsiung, ed., *Beyond China's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 for the U. S. and Its Asian Allie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5), pp. 132~151; V. P. Dutt, *Chin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Praeger, 1966); Harold C. Hinton, *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6); Allen S. Whiting, "Foreign Policy of Communist China," in R. C. Macridis, ed.,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Politics*, 8th ed.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92), pp. 222~267; Harry Harding, "The Domestic Policies of China's Global Posture, 1973~78," in Thomas Fingar, ed., *China's Quest for Independence: Policy Evolution in the 1970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pp. 93~146; Thomas Fingar, "Domestic Policy and the Quest for Independence," in Thomas Fingar, ed., *ibid.* pp. 25~92; David Bachman, "Domestic Source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Samuel S. Kim ed., *op. cit.*, pp. 31~54; Samuel Kim, "New Directions and Old Puzzle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Samuel S. Kim, ed., *op. cit.*, pp. 3~30.

者：周煦、蘇起、趙春山、邱坤玄、朱新民、趙建民等。<sup>②</sup>

多元因素研究途徑在中共外交政策研究早期便受到學者採用，一直到目前仍受到許多學者的重視。此途徑強調中共外交政策的複雜性，他們透過系統性的分析，從國際、國內及個人等層次著手，對可能影響中共外交政策的因素進行推演，以求取得影響不同時期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要根源。採多元因素研究途徑學者，有些是從中共內部因素為主著手，強調中共內部多元因素的互動制約其外交政策的制訂，有些則強調國際、國內因素互動的重要性，把國際、國家、個人等層次納入整體考量分析。總體而言，多元因素途徑是希望透過更廣泛的分析，來找尋出影響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

多元因素途徑的研究可解決前述多數研究途徑僅偏向某一單一因素的重要性，避免落於過於簡單化，同時，更可透過系統性的分析，使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更有條理。不過，由於多元因素研究途徑把所有可能影響中共外交政策要素列入探討，使得研究變得複雜化，在強調中共外交政策研究走向科學化的同時，學者致力於找尋制約中共外交政策的最主要根源，化約過多的因素，以便使研究簡單化，而多元因素研究途徑雖顧及多數要素，卻使研究複雜化，未能走向科學化。

### 叁、分析與展望

#### 一、研究途徑的優缺點與未來發展

從前述介紹可知，中共外交政策研究具有多種途徑，這些研究途徑具有時代的變遷意義，也各發展出重要的研究成果，對於中共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學化、系統化發展具有重要的貢獻，我們可以從前述的分析中，把這幾種主要的研究途徑的優缺點加以列表分析如下：

註② 參閱陳慶，「四十年來的中共外交」，見雷飛龍、華力進主編，*海峽兩岸四十年*（上册）（台北：革命實踐研究院，民國八十三年）：頁二六一～三二四；周煦，「六四事件後中共對美國的外交政策」，見周煦主編，*後冷戰時期中共對外政策*（台北：政治大學外交系所出版，民國八十三年）：頁一～二八；蘇起，*論中蘇共關係正常化，一九七九～一九八九*（台北：三民書局，民國八十一年）；蘇起，「戰略三角關係和中國的對蘇政策」，見倪孝銓、羅伯特、羅斯主編，*美中蘇三角關係，七〇～八〇年代*（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七〇～八五；邱坤玄，「『中共外交』教授教法之探討」，發表於「中國大陸研究與兩岸關係」課程教學研討會，政大學術發展基金會、政大東亞所主辦，民國八十六年一月廿四、廿五日；Chu Hsin-min（朱新民），“Communist China's Contemporary Foreign Policy, 1978~1984,” in David S. Chou, ed., *Peking's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80s*（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9），pp. 11~38；趙建民，「中共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見趙建民，*兩岸互動與外交競逐*（台北：永業出版社，民國八十三年），頁二三九～二六〇。

表一 中共外交政策主要研究途徑優缺點

| 研究途徑       | 優點                       | 缺點                                     |
|------------|--------------------------|--|
| 歷史文化研究途徑   | 掌握中國外交傳統延續性              | 1. 忽略中共強烈意識形態色彩<br>2. 未顧及時勢變遷之影響       |
| 意識形態研究途徑   | 掌握中共強烈意識形態色彩             | 1. 僅強調意識形態使研究過於簡單化<br>2. 有時間上的局限性      |
| 決策領袖個人研究途徑 | 掌握中共最高領袖在決策上的主導地位        | 1. 過於強調個人色彩使研究過於簡單化<br>2. 研究有時間上的局限性   |
| 國家利益研究途徑   | 掌握中共追求國家利益的基本立場          | 未能顧及意識形態及歷史文化對外交決策的制約                  |
| 戰略三角研究途徑   | 掌握國際層次因素對中共外交政策的制約       | 1. 未能顧及內部因素對外交政策的決定性影響<br>2. 戰略三角概念不完整 |
| 國際體系結構研究途徑 | 掌握國際體系對中共外交政策的制約         | 1. 過份強調國際體系的束縛<br>2. 未能顧及內部因素對外交政策的制約  |
| 派系政治研究途徑   | 結合西方利益團體與傳統中國文化研究        | 1. 難以檢證派系對外交政策的影響<br>2. 派系概念不完整        |
| 決策系統研究途徑   | 掌握外交決策過程及決策者心理認知符合實際政治運作 | 文件資訊不足不易檢證                             |
| 多元因素研究途徑   | 掌握中共外交政策複雜性多層次分析         | 過於複雜化                                  |

從表一的分析可以發現，各種研究途徑都有其主要的優缺點，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某些研究途徑可能有較強的解釋性，但卻不易成為普遍性的研究途徑，使得研究上具有時空的局限性，某些研究途徑雖能夠突破時空的局限性，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理解中共外交政策，但無法掌握中共外交政策上的特殊性，使得解釋性無法全盤深入。

就研究途徑的針對性而言，歷史文化、意識形態及決策領袖個人等三種研究途徑，基本上是將中共作為一個特殊的對象來進行研究，強調中共政權的特殊性，不論是具中國歷史文化的傳承、馬列主義高度意識形態色彩，或是毛澤東等獨裁領袖的獨斷決策等因素，前述研究途徑凸顯中共外交政策的特殊性，確能提供一個深入而獨到的面向來解釋中共外交政策根源。如果，在這些研究途徑的基礎上，擴大研究範疇，與一般國家外交政策的分析概念相結合，將可減少過於簡單化、特殊化的批評。

戰略三角、國際體系結構與派系政治研究途徑對中共外交研究提供了國際與國內環境不同省思的層次，戰略三角與國際體系結構研究途徑強調了國際環境對中共外交政策的影響，而派系政治則把中共權力鬥爭互動引入外交政策的研究，都擴大了中共外交研究的視野，不過，兩者在概念上同遭質疑，且研究的切入點雖避免了特殊化的局限，但兩者同樣面臨對中共外交解釋性不夠周延的困境。但如果把此二研究途徑的思考面向與其他途徑相結合，將可使中共外交的研究更符合實際政治運作的原貌。

國家利益、決策系統研究途徑，在研究上提供了多層次的思維，國家利益研究途

徑已明白指出作為國際體系成員之一的中共政權，外交政策的制訂仍在國家中心的思維下運作，決策者以理性的分析，採行最符合中共最大利益的政策；決策系統研究途徑，則把決策機構的角色與決策者對外在環境主觀認知的因素納入政策制訂的考量。在這樣的系統研究下，中共外交政策研究確已走向相對客觀的科學化、系統化研究，不過，上述二研究途徑若能結合其他研究途徑的優點，作進一步的補強，則可使外交政策研究走向巨型理論的方向發展。

多元因素研究途徑確實過於複雜，不過，在從事中共外交政策研究時卻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同時，可避免單一因素造成的主觀評量或過於簡單化思維的困擾，因此，吾人在從事中共外交政策研究時，可從多元因素研究途徑著手，在考量不同時期外交政策的印證時，能夠再從中分析推演制約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因素，使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走向更具科學性的途徑。

## 二、中西方學者研究途徑的分析

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中西方學者對中共外交政策研究的專書並不多，主要的出版品仍屬於介紹性的著作，<sup>①</sup>一九六〇年代西方學者開始引用政治學、國際關係學的方法論對中共外交政策進行分析，從學術觀點對中共外交政策進行研究，在質與量的方面，西方學者，特別是美國學者，創造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也為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開拓了科學性的研究方向，各種中共外交政策研究途徑的開拓者與耕耘者中，西方學者貢獻了大量的成果。

臺灣早期的中共研究基本上屬於「匪情」研究，在客觀環境制約下，臺灣的中共研究具有政治性，更具有資訊上的限制，在早期兩岸敵對的氛圍下，要走向如西方學者一般的科學性研究並不容易。雖然如此，但臺灣學者從與中共長期的鬥爭經驗，與長期對中共的觀察中對中共外交研究仍有獨到的見解，早期臺灣學者從意識形態、毛澤東個人思想路線主導及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研究方法，激盪了西方學者的研究，<sup>②</sup>對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提供了啟發性的研究途徑。

隨著兩岸互動的發展，學者參與中共外交政策研究也增多，同時，在西方研究方法衝擊下，以及大陸資訊取得增多的互動下，臺灣學者對中共外交政策研究也日趨多元化，具科學實證研究的論著也日益增加，許多學者應用各種研究途徑，對中共外交政策研究作出頗多貢獻。

大陸學者對於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基本上仍以描述性的著作居多，早期大陸有關研究多受到政治上的限制，在研究的體例上也未能採用較嚴謹的學術著作格式，改革開放以後，學術性的文章與著作增多，不過，多數的著作多自中共官方角度來加以理

註① 康培莊 (John F. Copper)，「中共外交政策研究的現況」，見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國際問題講演集（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七十二年），頁三四〇。

註② 愛倫·懷丁 (Allen S. Whiting)，「研究中共外交政策的方法」，見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前揭書，頁三八～三九。

解，在研究途徑上，近年來也日益受到大陸學者的重視。一般而言，大陸學者雖未強調研究途徑的重要性，但多數著作多從國家利益途徑著手，來詮釋中共對外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許多自大陸赴美求學的學者，應用其對中共政治運作的認知，投入對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提供了豐富而具參考價值的研究成果。

總體來看，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中，美國學者長期的投注與關心，在成果上確實是相當豐富的，不但在研究途徑上開創或深化許多有意義的研究方向，同時，在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上，也提供了大量有創見的著作。美國學者有傳統研究方法論訓練的優勢，同時，對中共官方的訪談研究機會也較大，<sup>②</sup>是其優點；臺灣學者在研究方法論的訓練也日益精進，也可在相對客觀的立場上，對同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中共政權思維與官方文件，有更深的理解；大陸學者對中共政權的運作有深刻的實證體驗，同時對中共的官方思維、決策運作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雖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但仍可提供不同面向的觀察，俾便學者作進一步的探究。

## 肆、結 論

中共外交政策研究途徑的發展與國際關係學的研究方法及中共研究方法有密切的關聯性，前述幾個重要的研究途徑基本上都是在這些研究的啓發或引用的基礎上發展，由於西方國家對於政策內容及決策過程的資訊較為公開，在研究的資料來源上較為完備，而發展出許多極富價值的解釋途徑，不過，在引用到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上便受到限制。

中共向來就把外交當成一件極重要的工作來處理，周恩來便明白指出，外交如同軍事一樣，要有紀律，「一切都要事先請示、商討，批准後再做，做完後要報告」，<sup>③</sup>而中共外交界常有的「外事無小事」、「外交官是不穿軍裝的士兵」等說法，也說明了中共把「外交」視為政治上最敏感、控制最嚴的領域，<sup>④</sup>因此，資料取得的不易與不完全，使得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更形困難。

從前述的分析可見，中共外交政策研究有客觀上的困難，不過，學者們仍然試圖利用各種可行的研究途徑來解釋中共外交政策與行爲，美國學者雖提供了大量且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不過，海峽兩岸的學者在研究上，具有語言認知上的優勢，對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應可透過有組織、系統的研究取得更大的成果，超越西方學者在此方面

註<sup>②</sup> 美國學者包大可 (A. Doak Barnett) 一九八六年出版的名著中共外交決策：結構與過程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Structure and Process) 一書，便曾訪問到時任中共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此種對中共高層決策官員的直接訪談研究機會，至目前為止，兩岸中國學者似都未能有此機會。

註<sup>③</sup> 周恩來，「新中國的外交」，見中共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七。

註<sup>④</sup> 王緝思，「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國外交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一九九三年第一期 (一九九三年二月)，頁八五。



的成就。

在目前國內的中共外交研究上，如同前文介紹，許多學者在國外研讀或透過更易取得的資訊從事中共外交研究，已利用各種研究途徑對中共外交進行系統性研究，在未來的發展上，應可以語言的優勢、文化的優勢，再配合理論研究的訓練，從整合研究的發展面向著手，以多元因素研究途徑作為研究切入點，透過歷史、實證資料的檢證分析，提出更具解釋效度的研究成果，應是國內學者未來從事中共外交研究一個可行的方向。

至於大陸學界對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以歷史研究與政策說明為主，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一些中共外交政策的學術性研究，對於中共外交政策不再只是單純的辯護，也提出一些反思批判的看法，<sup>⑤</sup>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多數的著作主要仍以描述性的分析為主，而且對當前中共外交政策的分析也以說明及闡述性著作為主。

大陸學界對所謂「理論」的概念與西方不同，中共指稱的理論主要是為外交政策提出一套思想依據，用以指導外交行為，<sup>⑥</sup>此與西方學者把理論視為解釋現象的看法有所不同，理論既具指導性，其「政治純度」便很高，因此，大陸學界對外交政策理論便多依循官方制訂理論闡述，再加上，中共對外交領域的嚴格控制，對此領域所能探討的問題範疇更受到限制；此外，大陸對西方國際關係學術性研究主要是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sup>⑦</sup>大陸學界對國際關係學科的研究與交流主要是從改革開放以後才有較明顯的發展，不過，由於時間較短，尚未能建立較完整的研究體系。<sup>⑧</sup>主觀的研究認知與客觀環境的制約都影響大陸學界對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

不過，值得重視的是，大陸學界已廣泛引進西方學界有關的理論著述，並嘗試發展出一套「有中國特色」的研究成果，此外，近年來許多大陸留美學者、專家，以其在大陸的實務經驗，在美國學術界發表有關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論文，頗值得作為研究參考。

在這樣的條件配合下，中共外交政策研究也可望在中國大陸與海外取得良好的發展成果，在國內、西方與大陸學界朝向科學化、系統化研究的努力下，中共外交研究應可發展出更具解釋力的研究途徑，提供學界與現實國際社會更具參考價值的研究方法與成果。□

註<sup>⑤</sup> 近年部分大陸學者曾對毛澤東時期的中共外交政策提出不同的意見，參閱吳強，「中國的「一邊倒」外交政策」，見楊思正、俞冠敏主編，*社會科學爭鳴大系*，一九四九～一九八九，*世界經濟·國際關係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五二一～五二五。

註<sup>⑥</sup> 著名大陸國際關係學者宦鄉提到國際關係理論時便曾表示，國際關係理論的首要問題是要用來指導外交行動，參閱上海市國際關係學會編，*國際關係理論初探*（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五～七。

註<sup>⑦</sup> 大陸最早出現介紹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文章，可能是陳樂民的「西方現代國際關係學簡介」，見*國際問題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二期，頁五五～六四；最早出版並大量發行的專著應該是陳漢文編著，一九八五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國際舞台*上一書，參閱王緝思，前引文，註二一。

註<sup>⑧</sup> 何方，「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和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見袁明主編，*跨世紀的挑戰：中國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重慶：重慶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一四～一五。